

〔韩〕朴炳铉 著

社会福利与文化

——用文化解析社会福利的发展

高春兰 译
金炳彻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C917.7
20133

社会福利与文化

——用文化解析社会福利的发展

[韩]朴炳铉 著

高春兰 金炳彻 译



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福利与文化:用文化解析社会福利的发展/
(韩)朴炳铉著;高春兰,金炳彻译. —北京:商务印
书馆,2012

ISBN 978-7-100-09110-7

I. ①社… II. ①朴…②高…③金… III. ①社会福
利—研究 IV. ①C913.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85430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社会福利与文化

——用文化解析社会福利的发展

[韩]朴炳铉 著

高春兰 金炳彻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9110-7

2012年11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2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8 1/2

定价: 25.00 元

아산재단 연구총서 제 264 집

박병현

사회복지와 문화

문화로 해석한 사회복지의 발달

집문당, 서울, 2008년

本书据韩国集文堂2008年版译出

文化多样性决定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多样化

多年来，基于对现代社会保障制度19世纪80年代自德国产生后在全球发展进程的考察，我一直在高校课堂和一些论坛上阐述着这样一个研究结论，即：各国社会保障制度其实是所在国家及所处时代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其中：社会因素（风险与需求等）决定着社会保障制度的有与无；经济因素（发展程度与财力等）决定着社会保障水平的高与低；政治因素（政党政治与政治家等）决定着社会保障进程的快与慢；文化因素（历史传统与意识形态等）则决定着社会保障模式的最终选择。只有综合考虑上述因素的影响，才能理性地建构符合国情并与所处时代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然而，这样一个应当有高度共识的观点却很少在学术界产生共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流行的主流观点依然是社会保障制度由经济因素决定论，多的是基于经济因素的局部的、微观的、实证的研究成果，鲜有综合考虑社会、政治及文化等因素者。这种单纯的经济因素决定论及其在现实中总是低估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现象，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制度建设，它不仅导致了这一制度体系发展的滞后，亦造成了中国社会保障改革长期处于试验性状态而难以走向定型、稳定、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

我之所以将韩国朴炳铉教授所著的《社会福利与文化——用文化解析社会福利的发展》一书推荐给权威的商务印书馆出版并

介绍给中国读者，就是因为该书从文化的视角为我们解析了社会保障制度在不同国家的发展，它对中国学界甚为流行的单纯考虑经济因素的研究视角无疑是十分有益的弥补，并且更具长远的指导意义。因为与动态变化、殊途同归的社会、经济乃至政治因素相比，文化因素作为社会历史的积淀物，既在各国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又在全球范围内具有鲜活的差异性，对各国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及其走向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如果没有相通的文化认同，就不会形成国民对社会保障制度选择的真正共识，进而不可能产生长久稳定的社会保障模式，从而也就不可能有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尽管文化因素同样不可能替代其他因素，但立足于文化视角的社会保障研究，显然更具有历史的长度与厚度，更能够发现各国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与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于当代世界唯一有着五千年悠久文明并从未中断传承的中国而言，这恰恰是其社会保障学界所欠缺的。

在《社会福利与文化——用文化解析社会福利的发展》一书中，作者基于文化视角，确定的研究问题不是“为什么所有国家都选择了相似的福利制度”，而是“为什么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同的国家却选择了不同的福利制度”，“为什么有的福利国家能够灵活应对福利国家的危机，而有的国家却不能应对”，其探究的不是社会保障具有普适性的“理想模式”，而是打上不同文化烙印的“多样化模式”。作者认为，经济和政治因素虽然可以引发社会保障需求和满足这种需求的可能性，但是对于这种需求和可能性赋予具体形式的则是各国固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因此，要真正把握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现实，必须要理解该国过去

的历史遗产和文化传统。

为了说明文化对社会福利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作者首先以道格拉斯（Douglas）和威尔达夫斯基（Wildavsky）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把文化分为命运主义文化、阶层主义文化、个人主义文化和平等主义文化四种类型，并指出四种文化类型可以孕育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随后，又根据阿蒙德和维巴（Almond and Verba, 1963）、威尔达夫斯基（Wildavsky, 1990）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把英国和美国归为个人主义文化、德国和日本归为阶层主义文化、瑞典归为平等主义文化的典型代表，分析了这些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过程中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其比较的焦点是各国社会保障制度形成和变革的历史时期、动机和合理性以及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过程与各国文化的关系。例如，在个人主义文化中，社会成员往往在劳动力市场上通过与他人的竞争来满足自己的基本需要，而不是依赖国家或社会；当个人处于危机状态时，自己独立应对社会风险，自己承担责任，也不是依靠社会。因此，在个人主义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国民对以全民为对象、以强制参保为原则的社会保险制度并没有表现出更多的热情，除非发生大规模的经济危机或政治混乱等社会问题，否则不会考虑社会保障制度。在阶层主义文化成为主流文化的社会中，能够树立社会问题由社会负责的理念，进而形成以全民为对象的、具有预防性功能的社会保障制度。阶层主义文化中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父权制性质，即上下级关系分明，把享受不同待遇视为应然之事。在这样的文化中，有可能发展维持阶层间不平等关系的、具有社会控制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平等主义意识普及的社会，满足

个人基本需求的责任不在于个人，而在于社会，即贫困、疾病、失业等问题产生的原因并非是因为个人性格上的缺陷，而是来自于社会自身的矛盾，解决问题的主体当然也不是个人，而是国家。这种国家或社会的责任意识使政府能够制定出解决社会问题的完整的政策方案，进而确立以社会全体成员为对象的制度型社会保障制度。在本书中，作者肯定了世界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的背后渗透着该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当然，作者也承认，在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过程中，工业化和政治因素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但是用工业化和政治要素难以说明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领域，可以用文化因素来予以说明。因此，作者从文化的视角去分析和回答了为什么最早进入工业化国家的英国引入社会保障制度的时间相对较晚，而工业化进程相对晚的德国却最先创建了社会保险制度；为什么英国和美国人容易接受缩减社会福利项目的举措，顺利应对福利国家的危机；为什么德国和日本都强调社会福利的家庭责任；为什么瑞典能够成为福利国家的橱窗等问题。最后，作者以韩国为例，说明儒家文化的特点以及儒家文化对社会保障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作者指出，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家庭中心主义、“孝”思想和共同体意识，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韩国形成了强调家庭责任、弱化政府责任的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保障体系。作者认为，把韩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与西方的福利制度看作同质性状态，用西方国家开发的概念和框架来解释和研究韩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显然是有缺陷的，因为反映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历史和经验的事实或许在韩国并不存在，或许以变异形态存在，因而对韩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其实应该

用韩国固有的文化来解释和研究。在本书中，作者提出了东亚国家应该建立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有别于西方的东亚社会保障模式观点。

本书的特点是将历史、文化、福利（保障）三种概念交织在一起，在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历史分析中贯穿着文化的影响，而文化的多样性又决定着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多样性，这是让我产生共鸣的关键所在。因为我也观察到社会保障制度在各国不同发展进程与多样化发展的现实，并同样认为东亚国家因具有相通的文化基因而必定建立有别于西方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坚信中国只有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才能确立真正理性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的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必定会打上中国特色的烙印。

朴炳铉教授现执教于韩国釜山大学社会福利系，他长期从事社会保障研究，是一位有着丰硕研究成果的知名社会保障学者。我与朴炳铉教授相识于我们和一批中国、日本、韩国知名社会保障学者一起创设的“社会保障国际论坛”（2005年9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首届论坛，至2012年已举办了八届），随后又多次共同参与有关东亚社会保障模式研究第一阶段的研讨，尽管我的观点不可能与朴炳铉教授的看法完全相同，但重视文化因素对社会保障的深刻影响却是相通的，他的学术报告总能给我以有益的启发。不仅如此，朴炳铉教授还具有很高的音乐素养，他的歌声已经成为“社会保障国际论坛”晚会上的一道风景，这或许是他重视从文化视角来研究社会保障的一个原因。

作为朴炳铉教授所著《社会福利与文化——用文化解析社会福利的发展》中文版的推荐者，应当感谢他为我们提供了一本好

的社会保障著作，还应当感谢高春兰博士、金炳彻博士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好的中译本。

在该书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之际，谨以此序表示我的热烈祝贺！

郑功成

2012年10月1日于北京

中文版序言

拙著《社会福利与文化——用文化解析社会福利的发展》一书被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学者和学生，对此我感到非常荣幸。在本书中，我主要阐述了文化对社会福利发展的影响。文化的多样性使各国的社会福利理念、社会福利发展过程、社会福利发展水平、社会福利发展方向显示出多样化。因此，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以及政治要素可以成为社会福利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即使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发展过程有些相似，也不会使各国社会福利水平和发展方向在某一点上聚集而显示出趋同性。世界各国的社会福利制度表现为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的背后渗透着该国的传统文化。

基于这样的思考，本书确定的研究问题不是“为什么所有国家都选择了相似的福利制度”，而是“为什么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同的国家却选择了不同的福利制度”，“为什么有的福利国家能够灵活应对福利国家的危机，而有的国家却不能应对”，因而本书的基本前提并不是用“一种理想模型”（an ideal type），而是用“多样化类型”（diverse types）去解释福利国家。工业化以及伴随而出现的经济增长和权力资源可以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提供必要条件，但对其可能性赋予具体形式的是各国所固有的文化传统。因此在美国会形成反映美国文化的社会福利制度；在韩国会形成反映韩国文化的社会福利制度；在中国也会形成反映中

国文化的社会福利制度。

为了分析文化对社会福利制度形成的影响，本书把文化人类学家道格拉斯的文化理论作为研究背景。道格拉斯用“集团”（group）和“格栅”（grid）概念来说明文化。“集团”是人们在自身和外部世界之间筑起的界限，表明个人融合到特定社会组织的程度；“格栅”是指个人生活或者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受来自外部的规制和命令。在道格拉斯的文化理论中，强格栅—弱集团（high grid—low group）模式表现为集团界限弱、规制多的命运主义文化；强格栅—强集团（high grid—high group）模式体现的是集团界限强、规制多的阶层主义文化；弱格栅—弱集团（low grid—low group）模式表现为集团界限和规制都弱的个人主义文化；弱格栅—强集团（low grid—high group）体现的是集团界限强、规制弱的平等主义文化。把文化分为四种类型以后，本书把英国和美国作为个人主义国家的代表、德国和日本作为阶层主义国家的代表、把瑞典作为平等主义国家的典型代表，分析了文化对社会福利制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2009年本书被评为韩国学术院基础学科“优秀学术图书”，这给予我莫大的荣誉。若有机会，我想追加中国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利用文化理论分析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福利制度发展过程。

在翻译出版本书中文版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首先感谢为出版拙著中文版联系出版社的中国人民大学郑功成教授。在社会保障国际学术会议上，曾多次与郑教授见面并进行过学术探讨。郑教授对研究社会福利的热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

郑教授的长期交流定会对我今后的学术研究有很大的帮助。此外，对翻译本书的长春工业大学高春兰博士和中国人民大学金炳彻博士表示衷心的感谢。翻译是第二次创作，我确信通过两位的翻译将使本书更加精彩。最后对出版该中文版的中国商务印书馆致以诚挚的谢意。

韩国釜山大学 朴炳铉

2012年2月20日

前 言

2003年11月，我在日本参加学术会议时，偶然看到与体育相关的电视节目，便联想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第一天研讨会结束回到宾馆后，随手打开了电视，电视上正在直播日本职业棒球联赛第7轮比赛。比赛结束后，胜方运动员都冲出运动场，互相抱作一团庆贺胜利，每个运动员脸上都充满着胜利的喜悦，而此时电视镜头转向了输方球员席。败方球员的表情有些异样，运动员纹丝不动地望着胜方运动员在运动场上狂欢的场面。他们的表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天研讨会休息时，我同一位非常熟悉的日本教授谈到了昨天观看棒球比赛的情况，同时也向他询问败方运动员为何表现出那样的神情。那位教授想了想说，“那是输方运动员向胜方运动员表示敬佩的意思”。

回国以后，也是在一次偶然的时机，我在电视上看到了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比赛。在胜负已成定局的时刻，冠军队运动员也是冲出运动场，抱作一团，庆贺胜利，这一画面同在日本看到的画面是一样的。但是当电视镜头转向输方球员席时，运动员的表情却与日本运动员截然不同。他们在决定胜负的时刻，好像显示出“今年的棒球联赛结束了，该回家了”的表情，他们收拾球棒和手套，毫不留恋，连头也不回退出了运动场。同一现象，两国选手的反应如此不同，令我难以忘怀。阶层主义为特征的日本体育文化同个人主义为特征的美国体育文化存在着太多的差异。

在棒球比赛中，触击次数也是根据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美国职业棒球联赛中，如果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教练一般不会发出触击的信号，这个原因可以在美国的个人主义文化中找到一定理由。具有典型的资本主义体育性质的美国职业棒球联赛，对运动员而言，每一个球都直接与金钱联系在一起。在跑垒运动员在垒的情况下，如果教练对击球手发出触击的信号，那无意是牺牲触击者，使他可能会丧失一次得分机会，那将不利于该运动员年薪的增长。因此教练对运动员一般不轻易下达触击信号，如果教练觉得有必要触击牺牲而对击球手下达触击信号，那么教练员在事后一定会以个人名义向该运动员表示感谢，这是美国的惯例。但是在韩国或日本，为了球队的胜利而牺牲个人利益是当然之事，教练也毫无负担地对运动员下达触击命令，运动员也是为了球队的胜利而牺牲个人利益视为应然之事。因此在韩国和日本的职业棒球联赛中使用触击牺牲战术的情况往往比美国多一些。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各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对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样式产生的影响。文化是在一个社会中占据主导的经世代延续而形成的价值、态度、信念，即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文化对人的行为及其发展产生着重大影响，各个国家的文化也对该国社会福利理念、社会福利发展过程、社会福利发展水平、社会福利发展方向以及社会福利内容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因此，工业化、经济、政治要素是社会福利形成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即使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相似，也不会使社会福利水平和内容在某一点上聚集而显示出趋同性。世界各国的社会福利制度表现为多

样性，而这种多样性的背后渗透着该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当然在社会福利制度发展过程中，工业化和政治因素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但是难以用工业化和政治要素来说明社会福利发展的领域，可以用文化因素予以说明。本书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从文化的视角去解析社会福利的发展。

在本书中，我把文化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的文化理论应用于分析社会福利的发展过程之中，同时把刊登在《韩国社会福利学》第57卷第3号的拙作“福利国家的文化分析”的内容进行扩展。道格拉斯用“集团”和“格栅”的概念，把文化分为命运主义文化、个人主义文化、阶层主义文化和平等主义文化。在本书中，我把英国和美国作为个人主义文化、德国和日本作为阶层主义文化、瑞典作为平等主义文化的典型代表，在此基础上分析这些国家的社会福利发展过程中渗透的文化影响。当然这个工作并非易事，文化对社会福利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这已成共识，但把文化的作用同其他因素交织在一起阐述，同时又要把文化的影响力分立出来进行专门论述，这是一件艰难的事。在本书撰写过程中，因资料不足使我的研究常常处于停滞状态，但是一步步探寻渗透在各国社会福利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印迹，又让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魅力的工作。

留学美国的经历和经常探访或偶尔旅游日本、英国和瑞典的经历，对我撰写本书帮助很大。因为如果仅仅在一个国家生活，很难获取国外资料，但在某一个国家长期生活或者短期访问则有 6
助于相关资料的收集。

从小，我便一直沉醉于音乐艺术之中，这也有助于我撰写

本书。从中学开始我就参加教会合唱团，在大学时代经常参与大学生合唱团活动，以至于在合唱团度过的时间比在社会福利系度过的时间还要长。大学二年级时，曾想放弃在当时看来没有什么前景的社会福利专业，转到音乐专业，为此也彷徨过一段时间。当了教授以后，又开始学习单簧管并深深地陷入这一艺术殿堂之中。现在我经常参加釜山大学校友合唱团，还参加釜山米洛斯管弦乐队，演奏单簧管。我的家庭是艺术之家，在家族成员中有专攻美术、设计、钢琴的哥哥和妹妹，也有在纽约百老汇从事演艺活动，在费城管弦乐队演奏中提琴和钢琴的子孙们，而我的妻子和女儿都是学习风琴的。虽然参与各种艺术活动，沉浸在艺术之家的氛围中，但我始终关注着社会福利和文化的关系。再过几年，也许我会把社会福利与艺术联系起来进行著书立说。

在完成本书的过程中，我受到了来自多方的帮助。在此，向为我的研究提供良好环境的釜山大学社会福利系各位同仁表示诚挚的谢意。釜山大学社会福利系充满着和谐民主的气氛，以及所有的事都能通过对话方式解决的文化氛围，为我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本书的初稿曾用于2008年第一学期社会福利系研究生的“社会福利政策论”的课程讲义，研究生们的批判性评论对补充和完善本书的内容起了很大的作用。李汉玉博士阅读最终书稿并把文字修改得更加流畅细腻，对此表示由衷的感谢。对任何时候都无条件地给予我支持和爱的妻子梁承惠和可爱的女儿任丫、儿子仁俊也表示深深的感谢。最后我还要真诚地感谢生我养我而且时时刻刻为我祈祷的父母。家庭的理解和支持是我在学术上取得成就的最宝贵的财富。